

钱宾四先生
学术文化讲座

维柯的《新科学》
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

中華書局

钱宾四先生
学术文化讲座

錢穆

维柯的《新科学》 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

朱光潜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朱光潜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9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ISBN 978-7-101-12039-4

I. 维… II. 朱… III. 哲学思想-研究-意大利-中世纪
IV. 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5188 号

©香港中文大学 1979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

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书 名 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

著 者 朱光潜

丛 书 名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责任编辑 申作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4¼ 字数 65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039-4

定 价 30.00 元

图书策划:活字文化 ■■

总 序

金耀基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校六十周年，新亚书院之出现于海隅香江，实是中国文化一大因缘之事。六十年前，几个流亡的读书人，有感于中国文化风雨飘摇，不绝如缕，遂有承继中华传统、发扬中国文化之大愿，缘此而有新亚书院之诞生。老师宿儒虽颠沛困顿而著述不停，师生相濡以沫，弦歌不辍而文风蔚然，新亚卒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化之重镇。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下简称“中文大学”或“中大”）成立，新亚与崇基、联合成为中大三成员书院。中文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愿景。新亚为中国文化立命的事业，因而有了一更坚强的制度性基础。1977年，我有缘出任新亚书院院长，总觉新亚未来之发展，途有多趋，但归根结底，总以激扬学术风气、树立文化风格为首要。因此，我与新亚同仁决意推动一些长期性的学术文化计划，其中以设立与中国文化特别有关之“学术讲座”为重要目标。我对新亚的学术讲座

提出了如下的构想：

“新亚学术讲座”拟设为一永久之制度。此讲座由“新亚学术基金”专款设立，每年用其孳息邀请中外杰出学人来院作一系列之公开演讲，为期两周至一个月，年复一年，赓续无断，与新亚同寿。“学术讲座”主要之意义有四：在此“讲座”制度下，每年有杰出之学人川流来书院讲学，不但可扩大同学之视野，本院同仁亦得与世界各地学人切磋学问，析理辩难，交流无碍，以发扬学术之世界精神。此其一。讲座之讲者固为学有专精之学人，但讲座之论题则尽量求其契合关乎学术文化、社会、人生根源之大问题，超越专业学科之狭隘界限，深入浅出。此不但可触引广泛之回应，更可丰富新亚通识教育之内涵。此其二。讲座采公开演讲方式，对外界开放。我（个人）相信大学应与现实世界保有一距离，以维护大学追求真理之客观精神，但距离非隔离，学术亦正用以济世。讲座之向外开放，要在增加大学与社会之联系与感通。此其三。讲座之系列演讲，当予以整理出版，以广流传，并尽可能以中英文出版，盖所以沟通中西文化，增加中外学人意见之交流也。此其四。

新亚书院第一个成立的学术讲座是“钱宾四先生学术

文化讲座”。此讲座以钱宾四先生命名，其理甚明。钱穆宾四先生为新亚书院创办人，一也。宾四先生为成就卓越之学人，二也。新亚对宾四先生创校之功德及学术之贡献，实有最深之感念也。1978年，讲座成立，我们即邀请讲座以他命名的宾四先生为第一次讲座之讲者。八十三岁之龄的钱先生缘于对新亚之深情，慨然允诺。他还称许新亚之设立学术讲座，是“一伟大之构想”，认为此一讲座“按期有人来赓续此讲座，焉知不蔚成巨观，乃与新亚同跻于日新又新，而有其无量之前途”。翌年，钱先生虽困于黄斑变性症眼疾，不良于行，然仍践诺不改，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自台湾越洋来港，重踏上阔别多年的新亚讲堂。先生开讲的第一日，慕其人乐其道者，蜂拥而至，学生、校友、香港市民千余人，成为一时之文化盛会。在院长任内，我有幸逐年亲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和中国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这几位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有世界声誉的学人的演讲，在新亚，在中大，在香港，都是一次次文化的盛宴。1985年，我卸下院长职责，利用大学给我的长假，到德国海德堡做访问教授，远行之前，职责所在，我还是用了一些笔墨劝动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来新亚做八五年度讲座的讲者。这位自嘲为“杂家”、被汉学界奉为“宗匠”的史学家，在新亚先后三次演讲中，对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三个关键词作了

渊渊入微的精彩阐释，从我的继任林聪标院长信中知道杨先生的一系列演讲固然圆满成功，而许多活动，更是丰富多彩。联陞先生给我的信中，也表示他与夫人的香港之行十分愉快，还嘱我为他的讲演集写一跋。这可说是我个人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画上了愉快的句点。此后，林聪标院长、梁秉中院长和现任的黄乃正院长，都亲力亲为，年复一年，把这个讲座办得有声有色。自杨联陞教授之后，赓续来新亚的讲座讲者有余英时、刘广京、杜维明、许倬云、严耕望、墨子刻、张灏、汤一介、孟旦、方闻、刘述先、王蒙、柳存仁、安乐哲、屈志仁诸位先生。看到这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不禁使人相信，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莫不有对中国文化抱持与新亚同一情志者。新亚“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许多讲者，他们一生都在从事发扬中国文化的事业，或者用李约瑟博士的话，他们是向同代人和后代人为中国文化做“布道”的工作。李约瑟博士说：“假若何时我们像律师辩护一样有倾向性地写作，或者何时过于强调中国文化贡献，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弥补以往极端否定它的这种过失。我们力图挽回长期以来的不公与误解。”的确，百年来，中国文化屡屡受到不公的对待，甚焉者，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且遭到“极端否定”的命运。正因此，新亚的钱宾四先生，终其生，志力所在，都在为中国文化招魂，为往圣继绝学，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之设立，亦正是希望通过讲座讲者之积学专识，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中国文化阐释发挥，以彰显中国文化千门万户之丰貌。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者的演讲，自首讲以来，凡有书稿者，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如有中、英文书稿者，则由中文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同出版。三十年来，已陆续出版了不少本讲演集，也累积了许多声誉。日前，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向我表示，讲座的有些书，早已绝版，欲求者已不可得，故出版社有意把“讲座”的一个个单行本，以丛书形式再版问世，如此则搜集方便，影响亦会扩大，并盼我为丛书作一总序。我很赞赏甘社长这个想法，更思及“讲座”与我的一段缘分，遂欣然从命。而我写此序之时，顿觉时光倒流，重回到七八十年代的新亚，我不禁忆起当年接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几位前辈先生，而今狄百瑞教授垂垂老矣，已是西方新儒学的鲁殿灵光。钱宾四、李约瑟、小川环树、朱光潜诸先生则都已离世仙去，但我不能忘记他们的讲堂风采，不能忘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他们的讲演集都已成为新亚书院传世的文化财产了。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迎朱光潜先生来新亚书院讲学

金耀基

新亚书院在成立之始，即有公开学术讲座的制度，学术为天下公器之精神一直为新亚人所珍贵。1977年，我们募得一笔基金，创办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使讲座有了永久的基础。

新亚同仁相信学术没有国界、不分大学的世界精神，同时，我们更相信中国文化之发展，必须通过学术研究，中西文化之交流。以此，“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所邀请的讲者就不局限于一地一国，且有意识地使它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第一讲邀请钱宾四先生亲自主讲后，我们依次邀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主持讲演。这几位都是当今国际上对中国文化之研究有卓越贡献的学人，他们的讲堂风采固然在听众的心目中留下深刻难忘的

印象，他们的讲词通过专书的出版更是流传久远，影响不磨。今年，我们的眼光，又从西方返回东方，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的朱光潜教授作为 1983 年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

二

朱光潜先生，笔名孟实，是中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谈中国的美学，是不可能不联系到孟实先生的。诚然，朱光潜三个字与中国的美学是不可能分开的。从他学生时代《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31）这本书出版后，先生即在广大的青年读者心中建立起一个亲切而可敬的形象。先生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文艺心理学》（写成于 1931 年，1936 年问世）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代宗教说”以来，第一部讲得“头头是道，醺醺有味的谈美的书”（朱自清语）。接着，他发表了《谈美》（1932）、《孟实文钞》（1936）、《谈修养》（1946）、《谈文学》（1946），并译出他的美学思想的最初来源——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此外，他还出版了《变态心理学》（1933）、《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和《诗论》（1931 年写作，1943 年出版）。同时，在英哲罗素的影响下，还写了一部《符号逻辑》（稿交商务印书馆，不幸在日本侵略上海时遭炮火焚毁了）。1948 年初则出版了《克罗齐哲学述评》。这些极有分量并且在中

国美学园地上播种的著作，有许多都是光潜先生尚在英、法留学，德、意游历时期的产品。在英、法留学八年之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大学的图书馆里，一边研究，一边著述。从这些著作的质量，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先生读书之勇猛和写作之勤快。

光潜先生于1925年考取安徽官费留英，取道苏联，进入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与艺术史，亲炙谷里尔、侃普·斯密斯等著名学人。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并在海峡对面的巴黎大学注册，偶尔过海听课。巴黎大学的文学学院院长德拉克罗瓦教授讲“艺术心理学”触发了他写《文艺心理学》的念头，而在爱丁堡大学时，因为《悲剧的喜感》一文获心理学导师竺来佛博士之青睐，使他起念写《悲剧心理学》。后来，他离开英国，转到莱因河畔，诗哲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了极具原创性的《悲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的论文，嗣后并由该校大学出版社出版。去年5月，先生来函告诉我，这本原由英文写作的论文不久将有中译本（张隆溪译）问世了。

三

光潜先生的求学和学术事业是很曲折、很不平凡的。他于1897年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乡下，从六岁到十四岁，受

的是私塾教育，到十五岁才入“洋学堂”（高小），在高小只待了半年，便升入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这使他对古文发生很大的兴趣。1916年中学毕业，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员，虽然心慕北京大学之“国故”，但因家贫出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的中文系，由于师资不济，一无所获，幸而读了一年后，就通过了北洋军阀教育部的考试，被选送到香港大学读教育学。当时一共有二十名学生，他是其中之一。这二十个学生，尽管来自不同省籍，但在学校里则一律被称为“北京学生”。他在一篇回忆的文中说，“北京学生”都有“十足的师范生的寒酸气”，在当时洋气十足的港大要算“一景”。他与朱跌苍和高觉敷还赢得“Three Wise Men”的浑号。先生对当时的几位老师一直有很深的眷念，如老校长爱理阿特爵士、工科的勃朗先生、教哲学的奥穆先生。他对教英国文学的辛博森教授，尤为心折，以后并进入辛博森的母校——爱丁堡大学。

到港大后不久，国内就发生了五四运动。洋学堂对五四运动虽然漠不相关，但先生早就酷爱梁任公的《饮冰室文集》，在香港又接触到《新青年》，故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对先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他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用白话文写的。港大毕业后，先生曾先后在上海吴淞中学、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教书。在春晖，他结识了匡互生、朱自清和丰子恺几位好友，后来，

他们都到了上海，再交上了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夏衍，由于志同道合，成立了个立达学会，在江湾筹办了一所立达学园，并由先生执笔发表一个宣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主张。同时，他们又筹办了开明书店和一种刊物（先叫《一般》，后改名《中学生》）。“开明”就是“启蒙”，先生一生从事学术工作，但他并不喜欢“高头讲章”，始终不忘记教育下一代青年的责任，因此，总爱以亲切平白的文字，与读者对话晤面，在八十高龄之年，他还写了《谈美书简》这样深入浅出的文章。他在青年的心中，始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尽管他对美学有渊渊其深的修养，但他一直以散播美学的种子、丰富人生的艺术化为教育的目标。

先生学成返国后，应胡适之、朱自清和徐悲鸿的邀请，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班和中央艺术学院教书。那时文坛上正逢“京派”和“海派”的对垒，由于先生是胡适请去北大的，也就成了“京派”人物。后来，他与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等，主编了商务出版的《文学杂志》，这个杂志的发刊词就出于先生的手笔，他呼吁在诞生中的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应该广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应过早地窄狭化到只准走一条路；这是他文艺独立自由的一贯见解，也即他一早就主张百家争鸣，反对搞“一言堂”。事实上，他身体力行，《文学杂志》刊出的文章就并不限于“京派”人物的，像闻一多、冯至、

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文章一样出现在这份风行一时的刊物上。

四

在过去三十年中，先生的学术生涯是崎岖险峻的，学术文化界不断受到“左”和“右”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文艺界施行专政达十年之久，对文化学术到处设置禁区，出现强烈的反智主义的倾向，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无疑地，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对所有具有学术尊严与良心的读书人都是一个严厉的冲击与考验。光潜先生由于在美学上的领导地位，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批判对象之一。从1958年到1962年，大陆美学界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辩论，先生的学术观点受到严厉的批判。他对待这次批判的态度则是认真而不含糊的，他不亢不卑，“有来必往，无批不辩”，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学人的风范。在整个过程中，先生的心灵是开放的，他就事论事，就理以言理，安定而泰然。他不惮于修正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为了对美学有全面的体认，他且决心研究马列的美学思想，但当时一位论敌公开宣布：“朱某某不配学马列主义！”这样就更激发了先生致力马列的钻研，凡是译文读不懂的必对照德文、俄文、法文和英文的原文，并且对译文错误或欠妥

处都做了笔记，提出校改意见。我们应知道，那时，先生已近六十岁了，他对法、德、英各国文字原是极有修养的，但俄文则必须从头学起，他的俄文是完全自学的，他一面听广播，一面抓住契诃夫的《樱桃园》、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高尔基的《母亲》这些书硬啃，一遍一遍地读，有些章节到了可以背诵的程度，就以这样惊人的毅力学会了俄文，使他掌握了所有研究马列的重要语言。先生所写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文，以及他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关键章节的详透注释和评估，足可以使那些死抱马列教条而无真解的论敌汗颜无地。至于1963年先生撰写的二卷本《西方美学史》，则是他回国后二十年中一部下过大功夫的美学巨制，论者认为这部著作“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应非过誉！但“文革”爆发之后，这部著作被打入冷宫，而先生也被关进了“牛棚”，被迫放弃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牛棚”时，先生说：“我天天疲于扫厕所、听训、受批斗、写检讨和外访资料，弄得脑筋麻木到白痴状态。”像朱光潜先生这样正直、清纯、温厚的老学人都受到这样的糟蹋，“文革”对中国文化学术的摧残之大之深，可以思过半矣。

五

光潜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守在美学岗位上，尽管他在美学界赢得崇高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自立门户，也不企图成一家言，他所坚持的只是博学守约和科学的谨严态度，并且要把中国的美学接合上世界美学的潮流。他相信美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必须放在一个广博的文化基础上，他说：“研究美学的人如果未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在长年的美学论战中，他发现有些美学“专家”，玩概念、套公式，而仅仅拘守于几个僵化的教条，他相信这种廉价式的美学观主要是由于这些“专家”缺少美学必要的知识基础。先生认为思想僵化的病根是“坐井观天”、“画地为牢”和“固步自封”。他常把朱晦翁的一首诗作为座右铭：“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而光潜先生的源头活水则是东西方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的经典著作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不可盲目排斥，必须一分为二，做批判性的接受与继承，所以他自五十年代以来，孜孜不倦，继续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歌德的《谈话录》以及三大卷的黑格尔的《美学》；他于八十高龄之后，还以两年的时间译了维柯四十万言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这些伟大的经典著作，都是光潜先生的源头活水，所以他的生机不绝，精

神常新。我们知道，只有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掌握，中国美学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有更高更远的视界和发展！

讲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先生一直就主张思想的自由与解放，由于“文革”的毒害，学风败坏，邪气滋长，陷阱处处，寸步难行，温文敦厚的光潜先生也发怒了，他挺身而出发出“冲破禁区”的讨檄令。他要冲破“人性论”的禁区、“人道主义”的禁区、“人情味”的禁区、“共同美感”的禁区，特别是“四人帮”“三突出”谬论对于人物性格所设的禁区。他说：“冲破他们所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按照文艺规律来繁荣文艺创作，现在正是时候了！”光潜先生所发的怒不是个人的，而是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前途而发的！但丁的“地狱”门楣上有两句诗告诫探科学之门的人说：“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先生没有犹豫，没有怯懦。

六

朱光潜先生今年已经是八十六岁高龄了，但他在学术的前线上还没有退下来。事实上，在他，学术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他说：“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这不只显示了他对学问的炽热，也显示了他生机的丰盛。六十岁开始学俄文，八十岁之后译《新科学》，这是何等精神！真的，光潜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学术园地里耕耘，最近